

## <<致命的自负>>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致命的自负>>

13位ISBN编号：9787500427933

10位ISBN编号：750042793X

出版时间：2000-09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英）哈耶克

页数：226

译者：冯克利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致命的自负&gt;&gt;

## 前言

序 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

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

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列举。

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 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有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 W. Bartley, III）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草稿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 A. 哈耶克 1988年4月于弗莱堡

## <<致命的自负>>

### 内容概要

《致命的自负》是哈耶克的全集——哈耶克著作的标准版本——的第一卷。读者想必会有深刻的感受，这部新作的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因此他们也会乐于对《西方现代思想丛书10：致命的自负》的背景有所了解。1978年，年届80高龄，与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战斗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让这场论战有个了断。他设想举行一次正式的大辩论，地点很可能是在巴黎，让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家与知识界中赞成市场秩序的领军人物对垒。

他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吗？”

“赞成市场秩序的人将会证明，不管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而且历来如此；本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的失败，从整体上说便是这些科学谬误的直接后果。”

## <<致命的自负>>

###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F.A.哈耶克 译者：冯克利 等 弗里德里希·A.哈耶克（1899-1992），二十世纪著名古典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与经济学，并于1921和1923年先后获得两个博士学位，曾在奥地利贸易周期研究所工作。

1931至1950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经济科学与统计学教授，嗣后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和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1974年获诺贝尔经济奖。

哈耶克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对货币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和政府干预的研究，但他对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纯粹资本理论》、《通向奴役之路》、《个人主义与秩序》、《科学的反革命》、《感觉秩序》、《自由宪章》等。

## <<致命的自负>>

### 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

序

导论：社会主义是个错误吗？

第一章 在本能和理性之间

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

既合作又冲突的两种道德

不适应扩展秩序的自然人

智力不是文化进化的向导而是它的产物，它主要是以模仿而不是见识和理性为基础

文化进化机制不是达尔文主义的机制

第二章 自由、财产和公正的起源

自由和扩展秩序

欧洲文明的古典遗产

“没有财产的地方亦无公正”

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对象及其改善之道

作为自发秩序要素的组织

第三章 市场的进化：贸易和文明

秩序向未知领域扩展

贸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为可能

贸易比国家更古老

哲学家的盲目性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向财产挑战

我们的知识分子及其理性社会主义的传统

道德和理性：若干实例

错误序列

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

“解放”和秩序

第五章 致命的自负

传统道德无法满足理性主义的要求

传统道德的证明和改进

受事实知识引导的局限性；观察我们道德作用的不可能性

目标不明：在扩展秩序中行为的大多数目标

都不是自觉的或深思熟虑的

未知事物的有序化

为何不知道的也是不能计划的

第六章 贸易和货币的神奇世界

对商业现象的鄙视

边际效用和宏观经济学

知识分子对经济学的无知

对货币和金融的怀疑

对利润的指责和对贸易的轻蔑

第七章 被毒化的语言

语言是行为的指南

词语含混不清和协作系统的差别

## <<致命的自负>>

我们的泛灵论词汇和混乱的“社会”概念

模棱两可的概念——“社会的”

“社会公正”和“社会权利”

第八章 扩展秩序和人口增长

第九章 宗教与传统的守护者

文献目录

人名索引

主题索引

译名对照表

## &lt;&lt;致命的自负&gt;&gt;

## 章节摘录

书摘 在公元前5世纪——这当然早于亚里士多德——第一位真正伟大的史学家在着手写作伯罗尼萨战争史时思考早期的人们“如果既无商业，又无陆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除了满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那么他们绝无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因此“既不会建立巨大的城市，也不会成就任何其他伟业”（修昔底德，1，1，2）。

然而亚里士多德却忽视了这种见解。

如果雅典人遵照亚里士多德的建议——对经济学和进化茫然无知的建议，他们的城邦很快就会退化

成村庄，因为他关于人类形成秩序的观点，把他带向一种只适用于静止状态的伦理学。然而他的学说却支配了此后两千年的哲学和宗教思想，尽管事实上这些思想大多数是在一个高度动态的、迅速扩展的秩序中出现的。

亚里士多德对微观秩序中道德规范的系统阐述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托马斯。

阿奎那在13世纪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而更形严重，后来这导致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实际上被宣布为罗马天主教会的正统学说。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教会反对商业的态度，把利息指责为高利贷，以及它有关公正价格的说教和对利润的蔑视态度，都是彻头彻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当然，到了18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务上一样)的影响开始减退。

大卫·休谟发现，市场可以让人们“为别人提供服务，这无需他怀有真诚的善意”（1739/1886：

，289），甚至不需要他认识那个人；或使人们的行动“有利于公众，虽然他并没有那样的打算”

（1739/1886：，296），凡此皆由于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即使是坏人，为公益服务也符合他的利益”。

因为有了这种见解，自行组织的结构观开始降临人间，从此以后它成为我们理解所有这类复杂秩序的基础，而过去它们就像是一些奇迹，只有人类所了解的自己头脑的一个超人版本，才能使其产生。

如今人们逐渐理解了市场是怎样使每个人在规定的限制之内，把他的个人知识用于自己的个人目标，即使他对自己在其中活动的秩序所知甚少。

虽然有了这项伟大的进展，当然也是因为完全忽视了这项进展，一种依然渗透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观点，一种天真幼稚的、泛灵论的世界观，开始主宰了社会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书摘1 第四章 本能和理性的反叛 我们必须自我警惕，切不可认为科学方法的实践增强了人类理智的能力。

以为在一个或数个科学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士，在思考日常事务上也会聪明过人——与经验相悖者，莫此为甚。

——韦尔弗雷德·特罗特 向财产挑战 虽然亚里士多德对贸易的重要性茫然无知，并且一点也不理解进化现象；虽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纳入托马斯·阿奎那体系之后，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教会的反商业态度提供了支持，然而只是到了后来，主要是在17和18世纪的一些法国思想家中间，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发展，它们结合在一起，开始向扩展秩序的中心价值和各项制度提出了有效的挑战。

在这些发展中首要的是，同近代科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理性主义变得日益重要。

我把它称为“建构主义”或“唯科学主义”（仿照法语中的说法），在此后几百年里，它实际上控制着有关理性及其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的严肃思考。

这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一直是我过去60年来从事研究的出发点。

我在这些研究中力求证明，它是病态思维的产物，是一种滥用理性的错误的科学学说和理性学说，最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人类各种制度的性质和发生做出错误的解释。

道学家们利用这种解释，以理性和文明最高价值的名义，终于开始去奉承一些相对而言事业无成的人，教唆人们满足自己的原始欲望。

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

虽然这种学说的错误显而易见，它仍然支配着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也支配着文人们、艺术家们和知

## &lt;&lt;致命的自负&gt;&gt;

识分子的思想。

为了对以上所言做出澄清，我大概应当立即补充说，还有另一种也可以称为理性主义的流派，它对待这种问题有不同的方式，例如把道德行为规则本身视为理性的组成部分。

洛克就曾解释说，“然而所谓理性，我想它在这里并不是指构成思维训练和推理证明的理解能力，而是指明明确的行为准则，所有的优良品质和培养道德观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洛克，1955：111）。

不过在那些自称理性主义者的人中，持洛克这种观点的依然只占少数。

其次，向扩展秩序提出挑战的相关发展，也来自卢梭的著作和影响。

这位独特的思想家——虽然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反理性主义者和浪漫派——也抓住笛卡尔的思想不放，对它有着深深的依恋。

卢梭那些令人目眩的思想佳酿逐渐主宰了“进步”思想，使人们忘记了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的出现并不是因为人类从摆脱限制这个意义上“对自由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为了保护公认的个人安全领地上所做的努力。

卢梭让人们忘记了，行为规则必然是限制性的，它们的产物是秩序；这些规则正是通过为每个人用以追求自己目标的手段划定范围，从而大大扩展了每个人能够成功追求的目标范围。

正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的开场白里声称，“人类生而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因而他要人们摆脱一切“人为的”限制——使那些一直被称为野蛮人的人，一变而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真正英雄，鼓动人们抛弃那些维系着他们的生产力和人口数量的限制，提出了一种对自由的获得构成最大障碍的自由观。

在宣称不管是同传统还是同理性相比，动物的本能为人类进行有序合作提供了更好的指导之后，卢梭又发明出虚幻不实的人民意志，或“普遍意志”，通过这种意志，人民“变成了一个单一的存在，一个个体”（《社会契约论》，I，vii；另见波普尔，1945/1966：II，54）。

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主义，允诺把我们重新带回天国，在那里我们的本能，而不是限制这些本能的通过学习得到的规则，将使我们有能力“征服世界”，正像《创世记》给我们的教诲一样——这种理性主义致命的自负，卢梭的以上言论大概是其主要的根源。

不错，这是一种很有诱惑力的观点，但它的威力（无论它自己怎么说）很难说是来自理性和证据。

我们早就知道，野蛮人远不是自由的，他也不可能征服世界。

除非得到他所属的群体的同意，他几乎什么事都不能做。

个人决定要以个人的控制范围为前提，因此只有随着个人财产的进化才成为可能；个人财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超出头领或酋长——或集体的——认知范围的扩展秩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尽管存在着这些矛盾，卢梭的呼吁毫无疑问却十分奏效，或者说，它在过去二百年里已动摇了我们的文明。

然而，它骨子里虽然是反理性主义的，但是由于包含着笛卡尔主义的暗示，即我们能够利用理性直接满足我们的自然本能并能够用理性为此找到理由，它却对进步论者颇具影响。

卢梭为知识分子发放了许可证，使他们得以抛弃文化限制，为争取不受限制——自由之成为可能，正是因为这些限制——的“自由”找到了理由，并且能够把这种对自由基础的攻击称为“解放”，此后人们对财产的怀疑便日益加深，不再普遍认为它是促成扩展秩序的关键要素。

人们日益认为，规范分立的财产范围与转移的规则，可以用中央对其用途的决定权取而代之。

到了19世纪，对财产在文明进展中的作用进行严肃的理性评价和讨论，在许多地方似乎都成了一种禁忌。

在这个时期，在许多本来想对财产进行研究的人中间，它也日渐受到了怀疑，成为那些相信能够对人类相互合作的制度进行理性重建的进步论者极力回避的一个话题。

[这种禁忌一直延续到20世纪，例如它在布赖恩·巴里有关(财产的)习惯用法和“分析”的陈述中有所表现(巴里，1961：80)，其中公正“从分析的角度看，是同‘应得的赏罚’和‘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正确地说，休谟所说的一些‘公正规则’是不公正的”。

又如缪达尔后来关于“财产和契约禁忌”的言论(1969：17)。

]例如，人类学的奠基人日益忽视财产的文化作用，因此泰勒的两卷本《原始文化》一书，索引中竟没



## <<致命的自负>>

有出现财产和所有权的条目，韦斯特马克确实用篇幅很长的一章讨论了财产，但他在圣西门和马克思的影响下，认为财产是一种应予反对的“不劳而获的收入”来源，并由此断定“财产法迟早会发生重大变化”（1908： 1，71）。

社会主义者的建构主义偏见对当代考古学影响甚大，不过它在理解经济现象上的无能，最为粗俗地表现在社会学里(所谓“知识社会学”的情况更糟)。

社会学本身几乎可以被称为一门社会主义科学，它历来公开标榜自己能够建立一种社会主义新秩序(费里，1895)，更晚近的说法则是，它能够“预测未来的发展并塑造未来，或……创造人类的未来”（塞杰斯特，1969：441）。

就像一度虚妄地声称要取代一切专业化自然研究的“自然学”（naturology）一样，社会学一直傲慢地无视对法律、语言和市场这类成长结构做了长期研究的成熟学科已经取得的知识。

.....

## &lt;&lt;致命的自负&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两条原则。

它没有脚注，凡是对主要结论无足轻重，但专业人士会感兴趣甚至认为十分重要的论证，我或是用小号字体表示，以提醒一般读者，他可以忽略这些论证，并不会因此错过主要结论所依据的要点；或是把它们集中在“补论”里。

因此，书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号内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确的情况下)出版日期，必要时在冒号之后标明页码，读者可据此查找书后的作者书目。

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则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个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个人即使列出他赖以获得个人知识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尽他在漫长的治学生涯中承受的恩惠，更遑论编一份目录，把他所知道的、若想声称有资格涉足本书所讨论的这个广阔领域就必须研习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

对于我本人多年来基本上致力于同一个目标这一过程中得到的帮助，我不想——列举。

不过我希望向库比特(Charlotte Cubitt)小姐深表谢意，写作本书的那段时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没有她专心致志的帮助，本书也不可能完成。

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 W. Bartley, )教授，当我临近完成最后的草稿却患病不起时，他接过了这部书稿，为出版社对它进行了整理。

F. A. 哈耶克

1988年4月 于弗莱堡

## <<致命的自负>>

### 编辑推荐

《致命的自负》论证节奏明快，立场鲜明，既有颇为切合具体的实例，又不时露出犀利的辩锋，非常值得一读。

<<致命的自负>>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